

# 浅析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

——从民国《定海县志》到《鄞县通志》

唐燮军

**提 要：**陈训正的方志编纂思想，发育于编撰民国《定海县志》期间，成形于主修《掖县新志》之时，最终定型于总纂《鄞县通志》的过程中。它的形成，既深受《宝山县续志》等新型方志的影响，又是自觉向传统学术汲取养分的产物。也因此，它不但表现出中西兼有、新旧杂陈的显著特征，更是民国方志编纂者日趋理性地探寻编纂体例与叙事结构两相平衡的具体例证。

**关键词：**民国《定海县志》《掖县志例目草创》《鄞县通志》 编纂思想

慈溪官桥人陈训正（1872—1943）在所作《哀冰集序》中自称：“少日自负许，谓士生斯世，诗文而外，自有事业在，故偶有所述，辄弃去，不甚爱惜。今已矣！四十、五十，忽忽无闻。自念生平，舍此无复高世，因立斯集。”<sup>①</sup>然而，尽管陈氏不愿仅以文士终其一生，但其平生最值得称道的“事业”，却是当年“不甚爱惜”的诗文，以及偶然涉足方志之林而主持编纂的《定海县志》《掖县新志》和《鄞县通志》。

1984年，陈训慈在整理其堂兄陈训正《晚山人集》时，将作于1943年的旧稿增订为《陈君杞怀事略》；而在稍前的1983年冬，赵志勤（陈训正孙女婿）亦尝应地方政协之征稿而撰就《陈杞怀先生事迹述略》一文。<sup>②</sup>这两篇缅怀惦念之作，在时隔多年后，引发了若干学者研讨陈氏方志编纂思想的热情，并涌现出《〈鄞县通志〉编纂详探——以天一阁藏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档案为中心》等论作。<sup>③</sup>然而，除周慧惠此文从经济史角度切入而不乏新意外，其余成果无论是柳建军《从民国〈定海县志〉、〈鄞县通志〉看陈训正的方志思想》<sup>④</sup>，抑或沈松平《从“当代方志的雏形之作”——〈民国鄞县通志〉看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sup>⑤</sup>，大抵只是对赵志勤相关论说的进一步细化，而且如同《陈杞怀先生事迹述略》，既未动态考察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过程，又涉嫌高估陈氏的方志成就及其学术地位。

## 一

定海虽在光绪八年（1882）纂成《定海厅志》31卷，但在民国元年（1912）改厅为县后，

① 陈训正：《天婴室丛稿》之四《哀冰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3），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87页。

② 按，陈训慈《陈君杞怀事略》的新增内容，一是对陈训正方志成就的引申，二是对陈氏“一生之总的精神”的概括；《陈杞怀先生事迹述略》后经陈训慈补缀润色，1984年发表于《浙江文史资料》第27辑，并更名为《宁波光复前后的陈杞怀》。详参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印行：《晚山人集》附录，1985年抄本。

③ 参见周慧惠：《〈鄞县通志〉编纂详探——以天一阁藏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档案为中心》，《浙江档案》2016年第5期。

④ 柳建军：《从民国〈定海县志〉、〈鄞县通志〉看陈训正的方志思想》，《浙江方志》2002年第4期。

⑤ 沈松平：《从“当代方志的雏形之作”——〈民国鄞县通志〉看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黑龙江史志》2002年第6期。

“风政推暨，非复旧观”<sup>①</sup>，确有重修地方志的必要。事实上，早在民国9年，就有王亨彦、汤浚等乡贤勉力为之，几乎同时撰成《定海厅志校补》《定海县续志》《定海县新志》和《定海厅续志》，唯因经费短缺而未尝刊行。<sup>②</sup> 降及民国12年春，沈任夫、程庆涛、贺家唐、张康甫、孙弥卿这5位旅沪定海士绅，复以“《定海厅志》修于清光绪八年，迄今四十余载，人事变迁，已不适用”<sup>③</sup>为由，聘请陈训正和马瀛重修县志。

据《鄞县通志·编印始末记》记载，旅沪定海士绅在发起重修《定海县志》之初，本拟邀约邑人马瀛主持其事，但彼时马氏正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无暇兼顾，乃介绍陈训正于乡人，而自任非异地人所能编之《风俗》、《方言》二门”<sup>④</sup>；其言下之意，便是陈氏之所以被聘为《定海县志》主纂，完全得益于其堂妹夫马瀛的引荐。《编印始末记》这段追述，虽涉嫌贬抑陈训正<sup>⑤</sup>，却可能是不争的事实。

陈训正出生于一个通过长途贩卖茶叶于浙赣两地而致富的“中人之家”<sup>⑥</sup>，但其父陈懿宝在光绪六年（1880）的早卒，尤其是乃祖陈士芳在光绪十二年的去世，既使得陈氏家境每况愈下，也使得15岁的他不得不弃贾业儒。此则《陈训正行述》言之甚明：

曾祖考以贸茶起家，欲府君世其业，议令入宁波某钱肆为徒，已成约矣，而曾祖考又弃养，某肆遽爽前约。时先三叔祖考依仁公甫弱冠，府君才（十三）[十五]龄耳。地多无赖，戚族失援，叔侄茕茕，相依为命。依仁公卒以家事琐屑自任，而命府君专心读书。<sup>⑦</sup>

弃贾业儒后陈训正的人生轨迹，大体上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886—1903年。这期间，陈氏虽学为科举，并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中辛壬并科举人<sup>⑧</sup>，但对科举考试并无好感，转而以传播新知、启迪民智为己任<sup>⑨</sup>，为此东渡日本采购科学名著，并约上海《通社》诸同好加以“分类移译，成《通社丛书》数十种”<sup>⑩</sup>。第二阶段：1904—1911年。在此一阶段，陈训正始则借助宁波知府喻兆蕃的赏识和重用，以宁波府教育会为平台，致力于兴办、改建各

① 冯开：《定海县志·叙》，陈训正、马瀛纂：民国《定海县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1993年，第38册，第433页。

② 参见民国《定海县志》册四丁《艺文志·书目（旧志附）》，“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8册，第552页。

③ 民国《定海县志》卷首《附记》，“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8册，第450页。

④ 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首册《编印始末记》，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3页。

⑤ 《编印始末记》之所以贬抑陈训正，很可能是因为在1938—1940年间，罔顾时局艰难而假公济私，抽印其所纂《鄞县通志·文献志》中的人物编。今宁波天一阁所藏相关书札9通（跨度1938.5.22—1940.3.15），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人物编的编印过程，详参周慧惠：《临时抽印本〈鄞县通志人物编〉编印始末考——以天一阁藏致马涯民信札为史料》，《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6年第2期。

⑥ 杨鲁曾：《官桥陈氏族义田会记》，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印行：《天婴诗辑·附录》，1988年抄本。

⑦ 陈建风等：《陈训正行述》，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1，团结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⑧ 参见陈建风等：《陈训正行述》，卞孝萱、唐文权编著：《民国人物碑传集》卷1，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2—25页。

⑨ 参见沈松平：《陈训正评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⑩ 陈训正：《钱君事略》，《天婴室丛稿》之六《逃海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3），第295页。

类新式学堂,而后又在继续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同时,开始涉足政界,于宣统元年(1909)当选为浙江省谘议局议员<sup>①</sup>;且逐渐走上革命道路,最终以宁波同盟会副会长、保安会副会长的身份,全程参与辛亥宁波光复之役。<sup>②</sup> 第三阶段:1912—1923年。尽管陈训正既是辛亥宁波光复的功臣,又有强烈的从政意愿<sup>③</sup>,却由于受到排挤,始则从宁波军政分府的财政部长降为参议员,不久又被迫辞职,从此主要活动于宁波、上海两地,并重操办报、兴学两旧业。这期间,陈训正因为合作开办私立效实中学、筹建佛教孤儿院、长期主持宁波中等工业学校的关系,而被外埠纸媒誉为矢志教育的“地方志士”<sup>④</sup>。但实际上,这一阶段他对宁波地方教育的贡献远不如清末。

由此不难发现,陈训正在1923年受邀编纂《定海县志》之前,除已撰作《鲛论》《燕太子丹论》《田横论》《汉高帝论》《书〈魏志·武帝纪〉后》《读〈史记·苏秦列传〉》等史论外,既不曾有编纂地方志的经历和经验,也并未表现出超群的史识与史才。当时的他,只是一个以能文善诗著称于宁波本埠和旅沪甬商中的落魄文人,并因办学不顺连带影响到他的经济收入和日常生活,故在其《天婴室丛稿》中,时或可见诸如“旅沪二年矣,媚生谄鬼,卖文求活,憔悴生涯,迄无长进”<sup>⑤</sup>之类的感慨。

## 二

受聘主纂《定海县志》,对穷困潦倒的陈训正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也因此,尽管并无编纂方志的经验,他仍迎难而上,进而在研读70余种方志的基础上,最终选定由进士出身而又曾“游学东瀛”<sup>⑥</sup>的钱淦所总纂的《宝山县续志》,作为《定海县志》的蓝本:

(定海县)《志》凡十六门,体裁节目,大半依据近刊宝山县钱《志》。十年以来,全国新志,无虑七十余种,独《宝山志》能不为旧例所拘,去取最录,差为精审,故本《志》略遵其例,而参之以马君瀛之主张。<sup>⑦</sup>

此所谓“略遵其例”,具体表现为:一是尽管《定海县志》效仿周济撰作《晋略》之成例,

① 参见《各省筹办咨议局·初选举开票(浙江·各属)》,《申报影印本》第100册,上海书店,1983年,第739页。

② 参见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文献志》第4册丁编《故实》之《辛亥宁波光复记略》,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1336—1339页。

③ 按,虞辉祖《寒庄文编》卷1《冯君木诗序》(1921年铅印本)云:“吾少闻陈、冯之名,后遂相遇,与交密。前年,余馆甬上,二君亦以避乱寓郡城,吾每与君木访无邪,游城北后乐园,为诗酒之会。吾不善诗,二君喜以诗相视。无邪尝欲有为,乱后意有所不乐,故其诗多幽沉郁宕之音;君木意量翛然,虽居困而有以自得,故其诗有萧旷高寒之韵,要皆吾甬上诗人之绝出者也。”

④ 静眼:《之江纪行(宁波)》,《申报影印本》,上海书店,1983年,第135册,第330页。

⑤ 陈训正:《答李审言先生书》,《天婴室丛稿》之七《庸海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3),第282页。

⑥ 钱淦、袁希涛纂:《宝山县续志》,冯成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上海书店,1991年,第9册,第413页。

⑦ 陈训正:《例目》,陈训正、马瀛纂:民国《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8册,第438页。

“依类排比，写定六册”<sup>①</sup>，却不但其内部结构与《宝山县续志》大同小异，而且在内容取舍上也不乏相似之处。譬如在钱淦等人看来，“自近世天文、物理日益发明，昔之所谓祥异者，无不可以学理推测。占候经验，其用亦鲜，然……先民之说，或亦信而有征，似不容遽废”<sup>②</sup>。而《定海县志·舆地志》亦谓：“灾异亦气候之一征，虽非其常，要不同荒诞难凭之记述。……占候由于积验，物理感应，有时而信。”<sup>③</sup>

二是《宝山县续志》凡“各目有变更曩例，或小易名称者，并于每目之下，撮叙缘由，期易明了”<sup>④</sup>。《定海县志》则又更进一步，不仅在总目下，甚至在分目中，亦往往用小字按语的形式，自我交代其构置该目的原因或做其他补充说明。例如《营缮志》“祠庙”下注曰：

案：旧《志》祠庙与寺观并列一门，非是。祠庙者，即古之所谓社，人群要约期会之所托者也。其兴废实系民户盛衰，非宗教徒之寺观比，故记之特详。<sup>⑤</sup>

三是陈训正等人在编纂《定海县志》的过程中，坚决贯彻《宝山县续志》“图表不厌增多，务求详密”<sup>⑥</sup>的原则，一则“参酌海关、陆军、水警等图七种”，绘成8幅“舆地图”；二则根据实测，绘制“城厢图”“普陀山图”和包括“县公署平面图”在内的5幅建筑图<sup>⑦</sup>；三则设计制作多达147张的各类表格。<sup>⑧</sup>

也正借由对《宝山县续志》等70余种新修方志的研读、拣择和吸收，同时通过自身的修志实践，陈训正相当自负地提出了“会通、趋新、质实、简略”的方志编纂理念：

方志之作，意在彰往开来。已往之利病，即未来之兴革也。昔人有言：“善言古者，合之于今。”故方志以表著地方文物嬗进之迹为先务。道古虽尚，合今尤亟，理则然已。自来作者，牵于前志成例，往往墨守局界，详其所不必详，而于地理、赋税、财产、民生、教化、风俗诸端，反无以会其要。流寓清望，引为土著，穷山恶水，标为名胜，傅会穿凿，难可穷究，科条舛杂，识者讥焉。<sup>⑨</sup>

然而，根据这一理念而组织的《定海县志》的内部结构，并未得到发起者的认可；陈训正也因此不得不在1924年春致信镇海赆浦人余岩，恳求章太炎的这位高足，帮他从章先生那里求

① 陈训正：《例目》，陈训正、马瀛纂：民国《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8册，第433页。

② 钱淦、袁希涛纂：《宝山县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9册，第639页。

③ 陈训正、马瀛纂：民国《定海县志·舆地志·气候》，“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75号，第111页、第113页。

④ 钱淦：《宝山县续志凡例》，钱淦、袁希涛纂：《宝山县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9册，第418页。

⑤ 陈训正、马瀛纂：民国《定海县志·例目》，“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75号，第10页。

⑥ 钱淦、袁希涛纂：《宝山县续志》，钱淦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9册，第414页。

⑦ 参见陈训正：《例目》，陈训正、马瀛纂：民国《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8册，第433—434页。但不知何故，在今民国《定海县志》中，未见有8幅“舆地图”。

⑧ 另有1张民国元年定海县警察署组织机构图和拟立而未立的3表（《各区村落列表》《各村居民氏族表》《各岛土质成分表》）。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定海厅志》虽多达31卷、60余万字，却仅有5表。

⑨ 陈训正：《例目》，陈训正、马瀛纂：民国《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8册，第433页。

得一篇序文，以便平息“彼中人士”的质疑：

云岫道兄足下：……去岁承纂《定海县志》，初稿已具。仆为此志，自信能籀《禹贡》《职方》之微，而洗《朝邑》《武功》之陋。彼中人士实鲜识解，见仆所规体裁、节目及去取详夺之间有乖旧例，颇致骇怪，窃亦无以自明。闻足下数数从余杭章先生游，丹穴久湛，自发威羽，敢以《例目》奉教；余一分，并求代呈章先生。……窃念章先生海内弘硕，一言之重，足以坚人信而祛众惑。倘因足下之请，惠赐一叙，俾仆之撰述得伸于已，悠悠之口有所沮折，万幸万幸！<sup>①</sup>

平心而论，“彼中人士”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这首先是因为《定海县志》在谋篇布局上，不但“有乖旧例”，甚而时有失误。例如为强调渔盐这一定海地方特色产业而设置《渔盐志》，其用意固然无可厚非，其内容却与《物产志》多相抵牾。此外，视电灯为交通业的有机构成而列入《交通志》<sup>②</sup>，将《关于各项公产之碑记》附录于《财赋志》末<sup>③</sup>，在《物产志》中表列“兽害”<sup>④</sup>。诸如此类的设置，表明陈训正虽勉力趋新，却显然尚未彻底完成新旧学术转型。

其次，是因为《定海县志》无论文本、地图抑或表格，皆未能超越《定海厅志》：第一，《定海县志》固然遵从宁波方志自宋元以来偏好做原始察终式考述的编纂传统，该书的叙事年限也因此上溯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定海设县之始，下逮民国13年（1924），但因过分追求简略，故其叙述完整性明显不如《定海厅志》。第二，陈训正在《定海县志·例目》中，曾对《定海厅志》卷1—3所列诸图大加鞭挞：“案旧志县图，轮廓才具，山高水深，礁滩航线，皆未尝著列。分图较详，山川、营建，尚具型范，而标识陈腐，未适时宜。署宇、祠庙各图，率皆意绘，方位距离，绝少准则。”但此类指责却与实情相去甚远，例如《定海厅志》卷2的28张舆地图，就莫不采用开方计里的网格绘图法，加以精心绘制而成：

案：《康熙志》，县境全图虽具，洋面在内而山海错杂，稽查倍难。今详加考核，除陆路外皆用开方，每方十里，明礁作圈，暗礁作十，而碍于行舟之处则加点，俾阅者了如指掌云。下分图二里开方。<sup>⑤</sup>

返观《定海县志》册首所列23图，不是平面建筑图，就是拍摄的照片，较诸《定海厅志》各图，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第三，在《定海县志》的147张表格中，诚然不乏诸如《全境船埠一览表》《全县盐产地列表》《十年以来主要食品价格比较表》之类的佳构，但仍有不少表格，或如《历代建置沿革表》，因过于简略而不足以全面反映定海行政建制的历史变迁；或如《展茅区祠庙

① 陈训正：《与余岩书》，《天婴室丛稿》之八《庸海二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3），第349—351页。

② 参见陈训正、马瀛纂：民国《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8册，第494页。

③ 参见陈训正、马瀛纂：民国《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8册，第504—506页。

④ 陈训正、马瀛纂：民国《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8册，第523页。

⑤ 史致训、黄以周等编纂，柳和勇、詹亚园校点：《定海厅志》卷2《图二·舆地全境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页。此外，《定海厅志凡例》亦云：“开方计里，推表山川，绘图之法也。……旧《志》县境有图，县治有图，学宫有图，村庄亦各有图，图实较他《志》为备。惟绘之之法，尚有未谙。今纂新《志》，专属一人遍历地界，得其纵横广袤里数，缩诸篇幅，而以开方行之，庶不失古人绘图之意。”

一览表》，理当与其他区域的20个《祠庙一览表》合而为一；至如《人物志》设10表以分类甄录历代人物的这一措置，更是大可商榷，因为在这10张表格中，人物的籍贯、生卒年、生前行迹等信息，都已被省略到难以再省，令人印象深刻的只是诸如“有功德于乡者”“列女”“游寓”之类的标签。或许也正有鉴于此，余岩（包括章太炎）对于陈训正的来信，未尝予以任何答复。

### 三

大概就在致信余岩的同时或稍后，陈训正又将《定海县志·例目》邮示其堂弟陈训慈的业师柳诒徵，随即得到柳氏大力推崇：

……陈君无邪、马君涯民，淹综史坟，贯以新知，近纂《定海县志》，示以《例目》。列志十六，分目七十，表纪传录，若网在纲，大氏袭故者十之二，创制者十之八。纵极天人，衡浹海陆，社间之会，米盐之产，黉序之政，教宗之枢，邮置走集，邸阁息耗，生齿盈牖，主客事较，计吏所上，瞽史所谕，罔不甄综，明其消息。盖虽区区一地之志，馭以龙门、夹漈之识，且究极其所未备，诒徵读之，叹观止矣。……斯志特崇民质，旁行斜上，义据通深，摭词述事，兼以笃雅，盖所谓损益得中、质文交胜者也。世有君子，当就是求史裁矣。甲子夏六月，丹徒柳诒徵。<sup>①</sup>

柳氏对《定海县志》的推崇，是否有助于平息“彼中人士”的质疑，因史载阙如而不得其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基本上框定了此后对《定海县志》的评判基调，例如黄侃在作于民国20年（1931）9月的《陈玄婴先生六十寿序》中，不但断言《定海县志》是一部足以傲视群志且又贻范将来的杰作，更认定陈训正是重修清代国史的合适人选，《玄婴诗辑》录其词曰：

……数年前，侃始得读先生所撰《定海县志》，观其编制条例，迥异于向来郡书、地理之为。……盖昔之方志，畸于考古，而此则重于合今；昔之方志，质者则类似簿书，文者又模袭史传，此志详牖表谱，位置有方，综叙事实，不华不俚；昔之方志，无过乡闾之旧闻，此志则推明民生之利害，使域中千余县皆放此而为之，不特一革乡志、国史之体制，实即吾华国民史之长编。……《清史稿》初出时，偶获流览，颇病其局守旧规而不知变，于清室非信史，于新国为谤书，诚欲考知此二百余年里之事迹，将茫乎无所依准。国家果思垂不刊之文于后，自非征集备三长者以从事，则必无以易前之失。如先生者，能为乡史示准绳，即能为国史成型范，此则在位者所未宜忽忘者也！

即便是《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责编，虽对《定海县志》的内部结构有所异议，却也仍以正面评价为主：

全志于列表一道，可谓畅乎其用，惟偏重太过。于《人物》不免阙略，于《列女》亦列表不立传，以为“贞孝之德，大都从同”，实则世俗贞烈节孝传略，固多千篇一律，且率出俗手，鄙俚无当，然节烈事迹，倘能择尤纪载，要足以存信史而昭激劝，似未可以概从简

<sup>①</sup> 柳诒徵：《跋》，陈训正、马瀛纂：民国《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8册，第591页。

省也。至于谊例之精要，载笔之简洁，要足为后来方志学家之楷模。<sup>①</sup>

与此同时，柳诒徵对《定海县志》的推崇，不但激发了陈训正进一步探求方志编辑理论的热情，而且使得他在短期内成为远近闻名的方志专家。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氏于民国15年（1926）6月接受掖县县长应季审的邀请，负责续编掖县地方志<sup>②</sup>，尔后又在民国22年1月被聘为《鄞县通志》的总纂。<sup>③</sup>

民国17年（1928）元月，陈训正纂成《掖县新志》20卷。这部方志虽然早在1932年就已毁于韩复榘与刘珍年这两大地方军阀的武装冲突<sup>④</sup>，但从残存至今的《掖县志例目草创》来看，仍不难发现其编纂原则，与陈氏当年纂述《定海县志》时的主张已有所差异。这类差异，首先表现为：陈训正在编纂《掖县新志》时，虽仍大力倡导“会通、趋新、质实”，却已不甚讲求“简略”：

方志之作，以表著地方文物嬗进之迹为先务。改国以还，运殊风变，纪载之道，古不如今，虽章实斋、恽子居复生，不至墨守其义例，势有然矣。民国十余年来，新修县志不下八十余种，然皆例目乖舛，不合于时，无足依据。惟宝山县钱《志》，稍参新例，拙著《定海县志》，更引其绪而广之，穷古往今来之蕃变以会其通，推天行人事之奥衍以治其究，体裁节目，断然创始，要能自成其义例。<sup>⑤</sup>

在谋篇布局上，陈训正虽仍乐意选用当地新修方志体例，但已更倾向于独立构思，最终在兼取新旧方志义例的基础上，将《掖县新志》的内部结构分为方輿、政教、食货、人物、艺文5门，并殿以《文献汇述》：

近见《泰安新志·编辑则例》，定为《輿地》《政教》《人物》《艺文》四门，四门中分类别目，要而不烦，洵足示民国县志之范，宜援用之，以为本纂之根据。更参用《定海志》例，增《食货》一门，凡关于人民资生事项之统计，皆入之。要之，编纂大意，务求质实有用、取征后来，叛古之消，所不辞也。又案《人物》《艺文》两志，指在阐扬，似以博取为当，然为义例所拘，往往不能尽辞。兹别辟《文献汇述》一门，附于志余，亦实斋义例

① 按，1934年8月，陈训正以《定海县志序目》为题，将《定海县志·例目》发表在由陈训慈主管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3卷第4期。刊发时，责编以按语方式在篇首加了这段评论。而在1933年4月，陈训慈曾在该刊第2卷第2期发表《浙江之县志与省志问题》，内称：“陈氏《定海志》借鉴《宝山》，自定体例，简以驭博，表以芟繁，既为全志之特色；而如《渔盐》则特辟为志，藉彰民生，《方俗》于备述风俗外，详考一邑之方言，进足以通之于浙东诸邑，尤皆为他志所未见。”

② 参见陈训正：《天婴室丛稿》第2辑之二《北迈集序》，1934年铅印本。

③ 参见陈训正：《编印鄞县通志缘起》，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首册《编印始末记》小字注，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2—3页。

④ 按，《烟台晚报》2008年3月23日第18版《稿本〈掖县城区详图〉》云：“自民国15年6月设局，至民国17年1月，始成底稿20卷，内附总、分详图25张，名曰《掖县新志》。乃于21年地方倭扰（亦即1932年韩刘之战），《新志》稿本全被炮燃，毁于兵。”

⑤ 陈训正：《掖县志例目草创》，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首册《编印始末记》小字注，第4页。

所许也。全志都为五门，其节目条附于后，俾采访有所持循云。<sup>①</sup>

同时，陈训正开始真正重视实地调查、采访，并为此在1926年6月和9月两度北上，辗转奔波于青岛、掖县等地收集史料，并因此留下了《旅次青岛》《掖城怀古》等23首纪游诗、词。<sup>②</sup>

假如说《掖县新志》的纂成，标志着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成形，那么，《鄞县通志草创例目》的问世，则意味着陈氏方志编纂思想的基本定型。继《掖县新志》五志并列之后，陈训正又将《鄞县通志》的内部结构，扩展为“分之则通古今，合之则通人物”<sup>③</sup>的六志，这一谋篇布局及其单独成编、随编随印的处置方式，应当说是精深评估时局后所采取的未雨绸缪之策：

陈训正知此巨著殆非（抗日）战事爆发以前所能结束，于是商同（编纂主任）马瀛，将《鄞志》区为《舆地》《政教》《博物》《文献》《食货》《工程》六志，各自为书，各有起讫，各载序目，使一志编成，急付剞劂，庶不致全功尽废。故《鄞志》体裁，又属新创，不特非寻常县志所可比拟，亦与《定海》《掖县》两志有出入也。<sup>④</sup>

基于对“方志之作，与时俱进，无义例可守，且各县地方性未必尽同，人民特殊风趋，今昔迁嬗，往往而异，故志之体裁节目，当随时地为增损，不能划一”<sup>⑤</sup>的这种认知，陈氏既规划创设了《舆地志》氏族目、《工程志》等新颖类目，又将旧式的《食货志》改造成为名称不变但内容全新的门类，诸如此类的构思，尽管后来并未为参纂者悉数承用，却也大体上确立了《鄞县通志》的叙事框架。《鄞县通志》所采用的民间集资、集体编纂、分工合作的运作模式和采访调查、测绘考验、整理统计、编目纂辑、排印校勘的工作流程<sup>⑥</sup>，较诸《定海县志》《掖县新志》，不但规划更细密，而且运转更高效。

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定型，就其成因而论，不能不主要归功于他在1927—1931年间的从政经历。在此期间，陈氏始则于1927年4月被任命为浙江省省务委员会委员<sup>⑦</sup>，继而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10月、1930年12月至1931年4月，两度就任杭州市市长<sup>⑧</sup>，终于1931年6月任职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然而，陈氏不但每次任职历时短暂，且其行政作风据说比较保守，也

① 陈训正：《掖县志例目草创》，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首册《编印始末记》小字注，第4页。

② 参见陈训正：《天婴室丛稿》第2辑之二《北迈集》，1934年铅印本。

③ 柳诒徵：《鄞县通志序》，柳定生等编：《柳诒徵勉堂题跋》，（台北）华正书局，1986年，第119页。

④ 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首册《编印始末记》，第4—5页。

⑤ 陈训正：《鄞县通志草创例目》，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首册《编印始末记》小字注，第5页。

⑥ 天一阁博物馆所藏《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表附单据粘存簿》，对此颇有记载。详参周慧惠：《〈鄞县通志〉编纂详探——以天一阁藏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档案为中心》，《浙江档案》2016年第5期。

⑦ 参见《省务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事公报》（宁波）1927年4月22日，第1张第1版。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任命看似突兀，实则必然。因为当时，其堂弟陈布雷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言之甚明：“回首民国十六年四月间，偕其大哥杞怀谒蒋介石于此，当张静江面，蒋公称其文婉曲显豁，善于达意。以此因缘，浮沉政海于兹凡二十一年矣。”

⑧ 参见陈训慈：《陈君杞怀事略》，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印行：《晚山人集》附录，1985年抄本。



因此备受疵议，如赵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杭州市长》<sup>①</sup>云：

杭州市政府于1927年国民革命军光复杭州后建立……首任市长邵元冲……同年十一月，邵元冲另有重用去职，继任陈杞怀也以省府常务委员的名义，兼任杭州市市长。……陈杞怀接任后力持撙节，不但量入为出，而且还要弥补邵元冲追随“特别市”的亏空。陈是个保守派的人，他接事后常对人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陈是慈溪人，起用了许多同乡人（宁波府属各县，如秘书主任方聘三、社会科长吴□等）。一些杭州人讥讽说：“杭州市政府变成宁波市政府了。”<sup>②</sup>

尽管如此，这5年的宦海生涯，仍不无积极意义——既丰富了陈训正的人生阅历，又锻炼了陈氏的组织能力，更使得陈训正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他的才情其实并不适合为官从政，“自是遂息影湖上，以读书著述自娱”<sup>③</sup>，进而合乎逻辑地将他从官场习得的组织管理经验，运用于对《鄞县通志》的规划和编纂，遂有六志的单独成编与随编随印，以及诸如此类的创新之举。

#### 四

陈训正在编纂《定海县志》《掖县新志》和《鄞县通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方志编纂思想。对此，柳诒徵早在作于1947年的《陈君杞怀传》中，就将之概括为讲求会通、聚焦民生、突显地方特色、重视图表功能和强调明道资治：

修县志三，曰《定海》，曰《掖》，曰《鄞》。起例征故，必其义之大而是邑之特异于他郡县者；彰往察今，断断于生计消息，直言之不尽，则扩以图表；纵午回贯，胥前志未具。一邑也，可方驾异域一国国史，乾嘉以来，名志乘所未有也。……浙东史学炳海宇。史者本于道而达于政，为艺尤阔，承自姬、孔，非浙之私。自章学诚以史才生清中叶，不敢言国史，乃寓其意于方志。君之方志，截然出章氏上。第读其所为方志，犹不足尽。君其“本于道而达于政”，都所著，一也。<sup>④</sup>

柳氏的这一概括虽已相当精准<sup>⑤</sup>，但至少仍存在两点缺陷。一是概括不够全面，除上列5条外，“崇尚团队分工合作”与“注重实地测绘调查”，其实也是陈氏方志编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考察不够深入，因而未能觉察陈氏方志编纂思想既渊源有自，其定型更非一蹴而就。

从自今而古的角度来看，陈氏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3年春到1924年末，亦即负责编纂《定海县志》之时。在此期间，陈训正由于缺乏相关经

① 赵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杭州市长》，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杭州文史资料》第5辑，1985年，第58—65页。

② 《时事公报》（宁波）附刊《五味架》1928年12月9日所录芷芬《陈杞怀先生离杭之去思》，却与此大相径庭：“慈溪陈杞怀先生，以一儒生，出任杭州首市市长。平日乡人只知先生之文学优长，而不知先生于政治之循绩，亦有令人钦佩者也。……一年以来，令行政举，市民大悦。”但相比较而言，这类报道可信度不高。

③ 陈训慈：《陈君杞怀事略》，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印行：《晚山人集》附录，1985年抄本。

④ 柳诒徵：《陈君杞怀传》，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印行：《晚山人集》附录，1985年抄本。

⑤ 赵志勤《陈杞怀先生生平事略》（附录于《天婴诗辑》）将之归纳为：“志例因而有创，贵在适时，亦复因地而异。”然则较诸柳诒徵《陈君杞怀传》之概括，多有未及。

验,一方面不得不重点效仿《宝山县续志》,用以组织《定海县志》的内部结构;另一方面,也得以避免像当时大多数方志编纂者那样(例如撰写《龙游县志》的余绍宋)深受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影响,转而直接采用新式编纂体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会通、趋新、质实、简略”的方志编纂理念。只是陈氏的这一理念,不但仅仅着眼于方志的功用,而且在编纂《定海县志》的过程中并未被严格遵循。譬如《舆地志》中的《各区村落列表》与《各村落居民民族表》,之所以有目无辞,固然与修纂经费不足有关,却更该是陈氏未能贯彻“质实”原则而不曾进行实地调查的结果。<sup>①</sup>正是这类认识上的局限和行为上的失误,使得《定海县志》有志“趋新”却又新旧杂陈,意欲“简略”但终究繁简失中。

第二阶段,1926年6月至1928年1月,亦即负责主修《掖县新志》之时。这部由陈训正独立构思而又独力撰就的方志,虽早已被毁于兵燹而难以具体考见其内部构造,却是陈氏方志编纂思想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从残存至今的《掖县志例目草创》来看,可知彼时陈氏不仅确立了注重实地测绘调查、讲求会通、聚焦民生、突显地方特色、重视图表功能等编纂原则,且对《掖县新志》大类目的名称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其数量也从《定海县志》的16个缩减到5个(大类目的内涵与小类目的名称、数量和内容,也理当做有相应改变);至如《文献汇述》的设置,则又充分表明陈训正在坚持“趋新”的同时,开始兼收并蓄章学诚有关方志宜“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且“三书相辅而行”<sup>②</sup>的理念和做法。

第三阶段,从1933年1月到1937年春,亦即负责总纂《鄞县通志》之时。在此期间,陈氏一方面沿着前一阶段的总体思路,从中西、新旧两相结合的角度努力改进《鄞县通志》的篇章结构;另一方面又根据其沉浮宦海的经验,预估时局必将趋于动荡,遂致力于优化编纂、排印等流程,这既使得《鄞县通志》在类目设置上更接近于近代学科分类,也为尽快纂成《鄞县通志》指明了方向。就在《鄞县通志》行将脱稿的1936年4月,陈训正又被委以主持编纂《慈溪县志》的重任<sup>③</sup>,并随即“综为舆地、政教、文献、工程四志四十五编”,唯因次年“抗日战起,事竟中辍”<sup>④</sup>,然考其《慈溪县志草创例目》有云:

兹依据新修《鄞县通志》立目……《鄞志》分舆地、政教、文献、博物、食货、工程六门,吾邑可省博物、食货二门,以博物附入舆地门之物产类,食货可附入政教门之财务类,拟定舆地、政教、文献、工程四大目。各大目之子目,亦照鄞例增削。<sup>⑤</sup>

由此可见,《慈溪县志》即便有幸问世,其编纂体例也因全据《鄞县通志》为蓝本而缺乏新意。这就从反向证明,陈训正的方志编纂思想已然定型于总纂《鄞县通志》之时。

据说民国学者之所以普遍关注方志创新,与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猛烈抨击息息相关,尤其深受梁氏“新史学”的核心观念——进化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sup>⑥</sup>陈训正对方志编纂理

① 事实上,陈训正本人亦尝有“异县羁旅之士,足迹未亲三乡,耳食不饱腹中”的抱憾。详参陈训正:《例目》,陈训正、马瀛纂:民国《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8册,第433页。

②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6《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中华书局,1985年,第571页。

③ 参见《慈县重修县志,聘陈杞怀为总编纂》,《时事公报》(宁波)1936年2月6日,第2张第2版。

④ 陈训慈:《陈君杞怀事略》,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印行:《晚山人集》附录,1985年抄本。

⑤ 陈训正:《慈溪县志草创例目》,《文澜学报》第2卷第1期,杭州古籍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5页。

⑥ 参见黄燕生:《傅振伦与民国方志学》,《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第2期。

论的探索,是否也与梁氏的“新史学”有关,因史载阙如而不得其详,但可以肯定的是,陈氏确实深受进化论这一外来学说的影响,并据以探讨方志的功用及其走向,如其《与余岩书》云:

仆窃以为方志之作,所以表著地方文物嬗进之迹,彰往开来乃其先务。而前人最录,博而寡当,非综核之实,虽以章实斋、恽子居之贤,其所持论,不能无偏,此亦时之风趋使然,不足怪,不足怪!使二贤者居今之世,成今之书,仆有以知其必不尔也。故睥然敢于反古,尽吾所知而务之,虽未敢自谓创作,要其用心之所至,立一时之条例,矫从前之习尚,自不同于应声逐响者流。<sup>①</sup>

此外,见诸《鄞县通志》,亦有“脱使土地之上,终古而无人物,则此块然而静者,亦将终古不离狃獠之域,进化云乎哉”<sup>②</sup>之论断。然而,尽管陈氏乐于汲取包括进化论在内的异域文明,用以填补自身知识的不足乃至空白,却终究由于语言不通、文字不识等缘故,使得他在涉足方志领域之初对新型方志的了解,并非源自对近代西方科学新知的直接接触,而是主要通过研读《宝山县续志》这类深受西学影响的新型方志。

事实上,陈训正非但未尝直接接触近代西方科学新知,而且大致从编纂《掖县新志》开始,一方面坚持辗转了解西学并据以探寻志例创新之道,另一方面又日益明显地倾向于从传统学术中汲取养分,对文献内涵的诠释及其对《鄞县通志·文献志》的构建,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证:

郑玄释“文献”为“文章、贤才”,较朱熹之训“典籍、贤人”,厥谊为长。盖三代所谓“文”,非仅指简策而言;而“献”,即识大之贤者与识小之不贤者,非独性行善也。故“文”之著于文字者,曰典籍,曰金石;“文”之著于语言者,曰俗谚,曰谣歌;“文”之著于周旋动作者,曰典礼,曰风俗。“献”之产于本土者,曰选举,曰列女;“献”之来自异地者,曰寓贤,曰职官,曰名宦;“献”之游方以内者曰人物,“献”之游方以外者曰释道,而以大事纪汇著其遗迹焉。此方志所以详列各门,以供后来者之稽征也。今综核人物、选举、职官、故实、艺文、礼俗、方言七类,而编为《文献》一志。<sup>③</sup>

陈氏方志编纂实践的这一动向,与其说暴露了新旧杂陈如陈训正者的保守心态和卫道本相,毋宁谓为民国方志编纂者在熟悉西学利弊得失之后,客观理性地探寻方志编纂体例与叙事结构两相平衡的有益尝试(惜乎仅止于中西兼有、新旧杂陈)。事实上,至晚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力求中西集成、新旧结合的认知和做法,非但不止方志一端,抑且不绝如缕。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陈训正:《与余岩书》,《天婴室丛稿》之八《庸海二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3),第350—351页。

② 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文献志》第1册甲编上《人物一》,第15页。

③ 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文献志·叙目》,第1页。《文献志叙目》虽非成于陈训正之手,但既然《文献志》无论名称抑或框架,均系陈氏所拟定,则《文献志叙目》对文献内涵的诠释,自当与陈氏本意相吻合。